



【媒体思想之胡志勇专栏】

(作者系《华商报》编辑)

几千年了 我们的奇迹怎么还是长城

物理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动机,概率学告诉我们奇迹不可能总是出现,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在中国,有一件事似乎要颠覆这些真理,那就是长城在几千年来始终是我们唯一的“世界级奇迹”,成百上千年来,不论时势世态如何波谲云诡,一碰到文化媲美、奇迹比拼,长城立刻就快马加鞭地杀将出来。近日,长城的这一地位受到某种挑战。

5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报道:以北京八达岭长城为代表的中国长城可能无缘世界“新七大奇迹”称号。28日,中国长城学会迫不得已已在八达岭长城展开拉票活动,鼓励更多市民和游客在投票截止日期(2007年7月7日零时)前投票。主办方称长城目前投票总数在前七名之外,但具体票数不予公开。据介绍,世界新七大奇迹评选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与世界新七大奇迹基金会联合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后结果将于2007年7月7日在葡萄牙里斯本揭晓。

“世界七大奇迹”最早是由公元前3世纪中东腓尼基旅行家昂蒂帕克提出的,他在周游亚非欧后提出了这个说法,更具体地说,所谓的“奇迹”其实是“建筑奇迹”,或匠心独具或气势磅礴或巧夺天工。那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筛选,在这两千多年来,人类的进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所以,七大奇迹也在与时俱进,后人又根据历史演进还提出了“中古七大奇迹”,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土耳其的索菲亚大教堂、罗马斗兽场等后发建筑名列其中,中国依然是万里长城。时至今日,“新七大奇迹”的评选再次拉开帷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展示一些与时俱进的建筑奇迹是奇迹评选的要旨之一,所以纽约自由女神像、巴黎艾菲尔铁塔、柬埔寨吴哥窟、德国巴伐利亚新天鹅堡,甚至悉尼歌剧院都成为热门候选建筑,中国的候选者却依然是雷打不动的万里长城。这总让人想起阿Q的话:我祖上也是阔过的!

当一些人为万里长城继续争当世界几大奇迹推波助澜时,一个很不合时宜的念头便冒了出来:几千年了,为什么我们的奇迹一成不变老是万里长城呢?按理说,建筑作为地域文化的浓缩载体,它的诞生一方

面体现了某种历史观,更重要的一方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观,甚至是一种文明观。从巴比伦空中花园到罗马斗兽场再到纽约自由女神像、悉尼歌剧院,其建筑风格记录了从蛮荒到文明的一种演进,从它们的巧夺天工中,还能看到历史的沧桑进步,文明的与时俱进。如果几千年了,某个民族的建筑奇迹还一成不变,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几千年过去了,我们在建筑方面依然无法超越前人,只能让几千年前的奇迹成为民族的“永动机”;二是我们在思维上患上了某种依赖症,无论文明如何演进,我们始终抱着古董不放,无视千年来的文明在其他方面的诸多进步。

抛开万里长城的建筑因素,其实长城的背后掺杂着很多其他文化因素。作为昔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成为军事力量和保守思维的象征;作为封建王朝帝王将相巡察的要津所在,长城蕴含皇权主义的意味;作为民族统辖范围的分界线,长城还有着浓厚的家国一体的象征意味。尤其随着一些对长城充满某种幻想主义的渲染,比如“长城是大自然中能肉眼看到的两大人工建筑之一”,万里长城更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主义外衣,让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依赖。这种“长城依赖症”有没有好处?当然有,比如耳熟能详的能激发民族自豪感。有没有坏处?也有,而且不小,它使民众从对长城的顶礼膜拜中强化了一些尚武、保守和皇权至上的潜意识,在这种意识笼罩下忽视了其他一些堪称奇迹的建筑。

如果这次长城真的最终落选“新七大奇迹”,我看也未必不是好事,起码能让不少人在痛定思痛后想一想:我们号称世界四大文明唯一连绵不绝的一些与时俱进的建筑奇迹是奇迹评选的要旨之一,所以纽约自由女神像、巴黎艾菲尔铁塔、柬埔寨吴哥窟、德国巴伐利亚新天鹅堡,甚至悉尼歌剧院都成为热门候选建筑,中国的候选者却依然是雷打不动的万里长城。这总让人想起阿Q的话:我祖上也是阔过的!

长城落选就是人类的悲哀?

■观点延伸

针对长城有可能因投票数目过低而被排除在世界“新七大奇迹”之外,北京八达岭特区新闻发言人称,长城如果此次落选,不仅是北京的悲哀,中国的悲哀,还将是世界人类文化的悲哀。

(5月29日《新民网》)

不知是这位新闻发言人词汇实在贫乏,还是心中确有无限悲哀之事,他一连用了三个“悲哀”,一个比一个层次高,最终上升到了人类文化的高度,好不壮观!

我十分不解的是,长城如果落选,怎么就会是“世界人类文化的悲哀”?莫非这位新闻发言人认为只有长城有资格入选“新七大奇迹”?我不敢擅自揣测长城入选“新七大奇迹”对于八达岭特区有关部门的现实利益。但如果从保护长城的角度考虑,入不入选的确无关乎“世界人类文化的悲哀”。毕竟,长城重在保护和存续,而非入选某某奇迹。尽管入

拉票重要还是保护重要?

■观点延伸

相对于拉票,我认为反对对长城的欠账或许更重要。

《长城保护条例》已于去年底实施,国家明确宣布对长城实行整体保护。但有调查显示:长城的保护现状很不乐观。明长城有较好墙体的部分已不到20%,有明显可见遗址的部分已不到30%,墙体和遗址总长不超过2500公里。文物遗存丢失严重。不仅如此,还有的地方盲目搞旅游开发,破坏长城。由于国家对长城保护尚缺乏统一规划,长城管理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零散状态。一方面,对有旅游价值的长城

段“新七大奇迹”可能意味着更好的保护,但也应看到,那些从未和“×大奇迹”沾上边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照样有保存得相当完好的吗?奇琴伊察金字塔保存完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见,保护文化遗产关键在于有对本民族历史的虔诚和对人类文明的敬畏。如果我们老是坐在推土机和挖掘机上,即便入选再多的世界几大奇迹,那些老胡同的命运也必定是飘忽不定的。

回到事情本身,谁都不会说长城入选“新七大奇迹”有什么不好,关键在于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入不入选,而动辄将其与“中国的悲哀”、“世界的悲哀”联系到一起很可能培养一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一个恶意的推测,如果有关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现实利益,这种“悲哀论”无疑是利用民族情感的搭便车行为,那可能真的要成为国人的悲哀了。

(何秋斌)

何时才能像芬兰人那样高考?

■公民发言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对近万家工地发出行政提示,以公开信的形式呼吁各施工单位合理安排工期,确保在高考、中考期间考生们有一个安静的休息和考试环境。

(5月29日《北京晚报》)

高考又要来了,各地的护考措施又在不断出台,真有必要这么紧张吗?不妨看一下人家芬兰是怎么高考的。

5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人大附中一位特级教师的文章,文中提到了他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最好的学校罗素中学考察的经历。校门口没人把守,我轻松地进入,上了四层楼,径直走进了一间大教室,几十个学生埋头写字。后来,秘书小姐告诉我:“今天是我们国家统一的高考日,刚才进去的是高考考场。”

这竟然是高考考场?全国高考,不是闹着玩的,你们怎么能这么松呀?刚才我进入考场时明明看见学生们没有紧张的神情呀?“高

考考场”里学生桌子上面明明放着蛋糕、饼干和各式各样的水瓶……这些东西哪能带进高考的考场呀?但秘书小姐说:“为什么不呢?没有影响嘛!”

当然,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情况,芬兰如此轻松的高考肯定是有其自身的原因的。比方说芬兰实行高等教育免费的教育体制,目前芬兰青年的大学入学率超过2/3等等。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高考的紧张空气往往都是人为制造的,而且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比方,近年来“高考保姆”竟然逐渐成了流行词汇,比方说各个城市近来越来越兴师动众的护考行动……

在一考定终生的大背景下,高考受到重视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几个人会不承认,我们对高考的重视已经太过头了呢?而我们又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像芬兰人那样轻松高考呢?以一颗轻松的心态参加高考,对考生,对家长,何尝不是很有好处呢? (裴矫健)

就让这样的医生去擦皮鞋吧

■热点纵论

一名有着近20年从业经验的外科医生,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想再做医生,哪怕去擦皮鞋》的文章,满腹牢骚地为医患关系紧张下的医生护士鸣不平,最后还无比委屈地表示,“我决定不再做医生,哪怕是去街边弄个铁桶卖烤红薯,哪怕是去擦皮鞋……”

(5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医疗卫生行业有“委屈奖”的话,也许这位医生凭此文就可以轻易问鼎。只是,这种委屈,本质上是一种虚妄的委屈,是一种缺乏医道人心滋生的委屈。这样的委屈,对于患者来说,就是极其可怕的灾难。

还是先看看医生是如何慷慨陈词的吧。面对法律在处理医患关系时将“谁指控谁举证”改为了“举证倒置”,这位医生竟然如此抱怨,“通讯行业是谁都知道的暴利行业,为什么不能给这些行业也来个举证倒置呢?”这位医生最为信奉的理念就是“医患关系是消费关系”,他所持的论断是,“当你没有钱治病救命的时候,商品是按值论价的,我

当然没有什么救死扶伤的责任和义务。”

原来,患者在这位医生的心中,就如同那些冷冰冰的生了毛病的通讯工具,就是只存在利益关系的消费者,这是多么无情的论调呀。而且,这位医生还极度愤愤不平地通过与国外医生对比,然后感叹“医生的工资是很低的,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是很长的,他们没有时间外出旅游”等等。

面对这一切,我想问全天下的患者,你们谁能指望这样的医生有一颗“医者父母心”?谁还能指望这样的医务人员是我们心目中的天使?谁还能对这样的医务人员不充满警惕与防范?

现在,那位备感“委屈”的医生表示不想再做医生了,也许他有着高明的医术,但我却不认为他离开医疗队伍就是一种损失,恰恰相反,对于这样只知道与患者较劲的医生,对于这样只知道把利益视为终极诉求的医生,对于这样无情冷漠的医生,我只能心里暗暗祈祷:还是赶快让他去街边弄个铁桶卖烤红薯,哪怕去擦皮鞋。(单士兵)

校车安全标准不能再空白下去了

■热点纵论

5月28日下午,湖北省麻城市龟山乡九里冲地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载有21名幼儿的面包车被一辆农用拖车追尾撞翻至右侧山崖,造成7名幼儿死亡,14名幼儿受伤。

(《新华网》5月29日)

儿童节快到了,但我们却不得不带着悲痛的心情去看这样的新闻。短短的一刹那,有多少个家庭失去了自己的希望,有多少个父母要忍受子女离去的痛苦。校车出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这辆面包车也可以称之为校车的话),也不会是最后一次,7个小生命的离去,再一次发出了这样带血的泣问:校车何时才能安全起来?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

偶然事故,谁也不希望悲剧发生。

但我想说的是,在校车缺乏统一安全标准,有关部门对校车管理相当漠视的背景下,黑校车的横行是必然的,没有特定资质的驾驶员驾驶校车也是必然的,超载、报废车当校车等现象更是必然的。当然,校车出事也将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不妨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来确保校车安全的。在美国,校车不仅有统一标志,而且像警车一样有警示灯,有可以提醒别的车子不要靠近的警示牌。美国交通部近年来更是颁布了36项用于校车的安全标准,包括校车车体结构、防倾覆保护等,更重要的是,校车必须由专业厂商制造。而在加拿大,校车有2-8个座位要配备安全座

椅的固定扣,以确保体重未达18公斤儿童的安全。有着特殊红黄灯的校车一旦开到,其他一切车辆必须让路。在路上,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与校车保持至少两三米的距离……

当然,在这些国家,不仅校车是按照严格标准生产并且拥有相当的通行特权,校车驾驶员也是经过特殊训练持证上岗的。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确保了孩子们能够坐着安全可靠的校车上下学。

反观我们国家,不仅没有针对校车驾驶员的专门培训,而且校车的车体也是五花八门——有拿公交车做校车的,有拿中巴车做校车的,

还有一些黑心的学校拿报废车辆来做校车。我们知道,相对于其他机动车来说,校车由于载有大批的孩子,它的安全性能应该更高,对驾驶员的要求也应该更严格。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路上跑的校车不仅不比其他车子安全,有的甚至更危险。究其原因,校车管理上的大量空白和标准缺失是根源。

我们经常动不动就说“如何如何呵护孩子”,尴尬的是,经常出事的校车却给了我们一记大大的耳光。校车安全不是几句口号就能换来的,我们要的是严格的校车安全标准和管理制度,它们才是孩子们身上最牢固的安全带。(冬晖)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安监局何以成为腐败重灾区?

■公民发言

5月28日,山西古交市安监局原局长闫全维受贿案开庭审理。

(5月29日《山西晚报》)

闫全维是继太原市万柏林区原安监局局长郝俊亮、杏花岭区原安监局局长奥建荣、盂县原安监局局长韩斌之后,山西落马的又一位安监局局长。

为什么山西的安监局局长“前腐后继”,令安监局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煤矿开采有着巨大的利润。带血的煤矿不断出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当人民把安全监管的权力交给安监局的时候,当煤矿开采的巨额利润诱惑着每个人的时候,监督他人的安监局却无人监督。

在制度设计上,监督者一开始就被置于道德楷模的位置,似乎他们是一群特殊材

料制成的人,天然地不会为利益所诱惑,只要自我约束,只要靠着道德自觉,便万事大吉。这种监督制约链的缺失或断裂,形成了制度监督的真空。另外,在安监局内部,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也付之阙如,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可令我困惑不已的是,监督的方式万万千,为什么对权力的监督如此艰难?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群众监督难以开展?反腐成果不可谓不丰硕,被查处的官员也不可谓不多,可依然有官员“前腐后继”。

现实一次次昭示我们,反腐必须依靠制度,让官员失去腐败的机会,使公权运行得到有效监督。(罗金)